

《世界如此危机》 连载(二十六)

高连奎 / 文

面对变化的各种新问题，美国社会实际处于一个“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然而，事情不会永远这样发展下去，在古典自由主义根深蒂固的时候，另一种自由观，在有良知的学者中也开始流行起来，并进而成为进步运动的思想基础，他们认为“一个软弱的政府是对自由的否定”。西奥多·罗斯福这样的进步改革者也极其清醒地意识到的，“如果不进行改革，有钱的工业家不断增长的权力继续压制民主”。

在这种情况下，进步时代的改革者寻找改革的办法。最后美国社会各个阶层开始从根本上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在进步主义者看来，自由资本主义导致的资本集中和特殊利益威胁着美国的民主和个人自由。这后来成为进步改革时期政治辩论的基调。在进步时代，放任自由的古代自由主义信念逐渐被一种新的信念所取代，即“民主社会应该为所有的人而运行”，绝不允许任何一个阶层可以随意控制、操纵其他所有人的命运。

这些进步知识分子和改革家们重新界定了政府的角色和作用。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开始放弃小政府或有限政府的信念，转而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帮助管制经济和为所有的人提供保护是政府的工作”。这时美国人开始对政府采取一种支持和积极的政治立场。进步改革运动最终汇总为一个目标，那就是，“必须改革政府结构，以使其回应‘人民的意愿’”。

进步时代的知识分子和改革者首先做的就是将社会责任引入了美国的民主政治。在进步主义的影响下，在美国社会各阶层开始意识到，民主需要包含一个社会的维度，在坚持个人主义的同时，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大家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每个人都应该有一点对他人的社会责任。因此，在公共对话和政策制定中，需要用社会责任意识来平衡个人主义。正如弗兰根指出的，“进步主义的关键问题是，在他们重构政府的过程中，必须在个人自由和社会责任之间进行平衡”。

一言之，进步时代的改革者放弃了长期以来主宰美国人价值观的“消极自由”的理念，转而采纳了一种“积极自由”的理念。在他们看来，“消极自由”实际上剥夺了大多数美国人民的自由，而且几乎所有的进步改革者都相信，过度地忠实于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已经严重地损害了美国的民主。因此，为了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业社会中保证人民的自由和维护民主制度，必须对自由主义进行调整和修正，用“积极自由”来取代“消极自由”。在以“积极自由”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理念之下，“公民和政府应该接受这一点，民主需要对社会的责任以及保护自由”。

进步时代的改革者还有一个共识。就是他们必须致力于制度建设，希望从结构上根本改革各级政府，使得政府能够有能力积极、负责地采取行动，解决当时存在的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

进步时代改革的行政目标是，改革政府的运作机制和方式，提高政府的效率，减少腐败的机会，建立更加对公民负责的政府；

进步时代改革的经济目标则是将大型企业置于公共控制之下，运用政府权威制衡私人商业利益，对市场进行管制，保护农民、工人、小业主和消费者的利益。

市政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1895年，芝加哥的改革者和积极的公民成立联盟，抗议市政府、州长及州议会是在收受贿赂之后免费将城市公用设施(主要是公共交通)的特许经营权授予商业寡头。1897年，该联盟成功地控制了市议会并支持进步主义改革者卡特·哈里森当选市长。芝加哥的成功鼓舞了各地的市政改革者，许多城市都成立了类似的组织，并活跃于市政改革领域。在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将公用设施纳入公共所有，而不再由私人企业控制。即使保留特许经营权制度，也开始将竞争引入私人企业的投标。

1901年9月，美国总统麦克利布利身亡，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继任总统。对于进步主义运动来说，罗斯福的意外就职无疑是一大福音，它使得进步主义改革从地方进入联邦层面。在两届任期中，罗斯福总统开始着手控制大企业“过度的权力”，加强了联邦政府进行经济和社会管制的权力和能力，对铁路、食品和药品、金融等企业进行监管，联邦政府开始起诉一些大型托拉斯。例如，在他的第一届任期，联邦政府起诉并分拆了摩根集团和洛克菲勒集团建立的北方证券公司，在第二届任期起诉了标准石油公司、美国烟草公司，杜邦公司等。

在罗斯福力主下，国会又陆续通过了一

些重要对大企业的行为进行监管的法律，加强联邦政府的管制权力与能力。由于铁路是跨州经营的，州政府很难对之进行有效监管。在罗斯福的推动下，1906年国会通过了铁路价位法，授权州际商业委员会规定合理的铁路运价。1906年，国会通过了肉类检查法和食品药品卫生法这两部非常重要的社会管制法律，打击政商勾结，维护公共利益。

同时，罗斯福加强了联邦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社会管制的力量。例如，通过法律增加司法部的编制，在商务部成立公司局，专门负责调查企业的跨州商业活动；成立食品药品局，专门监管食品药品安全。其次，在其第二任总统任期的最后两年，在罗斯福的支持下，国会通过了一些旨在保护劳工权益的法律。例如，支持通过立法来明确雇主对工伤和事故的法律责任。罗斯福还加入了当时刚刚兴起的自然资源保护运动。罗斯福强调要在发展与森林和水资源的长期保护之间进行平衡。例如，他支持将出售公共土地的收入转入灌溉，将三千英亩森林增加进国家森林保护体系。

同时，当时社会上越来越强大的“扒粪运动”也对这些改革提供了巨大的舆论支持。新闻“扒粪”运动其实是从一份名叫《麦克卢尔》的杂志对洛克菲勒家族的美孚石油公司报道开始的。杂志的创始人麦克卢尔起初是怀着钦佩的心情想要报道美孚石油公司的成功之路，他本意是想把美孚塑造成时代英雄，美国骄傲，负责撰稿的女记者塔贝尔也不是一开始就有意揭丑，忠于真实的原则和职业的本能敏感促使她穷追不舍，结果洛克菲勒的种种罪行，其中包括贪污、背信弃义、炸毁他人设备、腐败等等内幕被详细解剖，揭露无遗。塔贝尔愤慨地断言：公平的个人自由竞争已经不复存在。

最后她的长篇报道《美孚石油公司史》在《麦克卢尔》上连载15个月，轰动全国。从此，美国黑幕揭发的杂志如雨后春笋，一大批新闻记者和文化界人士笔锋所向，开始挖掘美国社会各个角落的阴暗面。从大工厂到贫民窟，从童工到女工，从红灯区到政治交易，从保险公司的欺诈行为到铁路公司的管理不善，从对工人的残酷压迫到种族歧视，许多肮脏而悲惨的社会现象一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扒粪者”们激发起整个美国社会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为改革创造了舆论环境和社会基础。这一运动还直接促成了修宪、食品检查法、联邦储蓄法、反托拉斯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等一系列的立法进程。

进步运动改革最重要的是，罗斯福成功地使“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应该发挥作用”这个核心的问题变成了美国的国家政治理念，成功塑造了关于政府角色的公共舆论，使得美国人越来越接受一个积极政府的想法。

1908年，塔夫塔当选美国总统。他是罗斯福支持的继任者。塔夫塔担任总统后继续推行罗斯福的政策。在塔夫塔时期，联邦政府起诉的大企业比罗斯福八年中起诉的大企业还要多，而且，扩大了政府管制铁路公司的权力，第一次将电话与电报公司纳入政府管制。此外，将更多地土地纳入联邦森林保护体系。塔夫塔还与社会安置运动和社会福利改革者携手支持工厂安全生产立法，建立了美国儿童局，保护儿童的权力。

1912年又是总统选举年，这次政治讨论的焦点是：如何从根本上重组美国社会？特别地，如何面对公司资本主义，竞选争夺主要发生在罗斯福和威尔逊之间。尽管他们的主张有所不同，但相同大于分歧。他们都主张必须对大企业进行管制，政府应该发挥积极主动作用，威尔逊后来当选，当选后他也沿着罗斯福开拓的改革路径进行改革，并在1913至1916年这一段时间将进步主义改革推向高潮，1913年美国开征了个人所得税。最引人注目的是，威尔逊建立了美国的中央银行——联邦储备银行。在其任期的后两年，威尔逊开始关注社会福利，在1916年，威尔逊制定铁路工人八小时工作时间法。此外，联邦政府拨款帮助州修建高速公路。在威尔逊的第一届任期，在全国美国范围内，各种进步改革的组织仍然非常活跃。

然而在美国进步主义改革进入高潮之际，1914年欧洲爆发“一战”。进步改革者既不希望美国卷入这场战争，也担心这会影响到国内的进步改革。所以，他们一般都是反对美国参战的。威尔逊也承诺美国保持中立。但是，1916年，威尔逊竟选连任美国总统成功之后，美国于1917年4月宣布参战。在一定程度上，战争缓解了美国国内的社会矛盾。战争形成的大量政府订单，刺激了美国的企业生产，使得企业获得了巨大的利润，进步主义开始退潮。

『编者按』

德国为何国富民强？北欧为什么幸福和谐，美国是如何建成“伟大社会”的，世界为何又陷入长期性危机？中国应对的方法在哪里？大危机就需要大变革。只有放弃旧思维，才能找到新出路！

澄清谎言：批判了目前流行的对经济危机种种错误陈旧、似是而非、利近害远的归因，总结了与福利有关的七大谎言。

分析时局：分析了德国“社会国”模式、北欧“合作主义”模式、美国“伟大社会”模式、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等之优劣利弊。内容翔实，理论扎实。

指出道路：中国的未来在于“新福利社会”，是继自由主义和福利主义之后的第三种模式，高连奎将之称为世界模式3.0，是一种市场化的福利社会。

(作者高连奎，知名经济学家，中国改革研究学者，“新福利社会”理论创始人，中国较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对经济进行管制的责任，以实现一种“安全的”经济发展和保护公共利益。其次，进步时代的改革改变了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时期，美国各阶层开始认识到，他们面对着某种自己无法控制的来自市场的力量，进而需要政府为他们提供一种保护。

联邦政府的权力得到加强，总统的行政权力也得到了加强，总统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可以影响美国整个国家经济和政治方向的权力。公民权也越来越从国家的层面来定义和理解，美国人逐渐从地方社区的公民转变成美国公民。

改革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仍有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同时，20年代的经济繁荣暂时掩盖了各种仍未解决的问题，持续十年的共和党保守派执政也使得这些问题未能引起足够的政治关注，而“扒粪运动”的旗手杂志也被保守派资本家收购。这些问题一直持续到1929年经济大萧条。面对大萧条，坚持保守主义的胡佛总统不仅未能缓解危机，反而加重了危机。这再一次改变了美国人对政府职能的认识，并导致1932年福兰克林·罗斯福上台，开始推行“新政”。从根本上讲，“新政”是进步时代改革的延续，它与进步时代改革是一脉相承的，它要解决的问题仍然是工业资本主义带来的各种问题。“新政”加强对进行的干预，减少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并且政府开始在社会福利方面承担起更大的社会责任。

从长远看，影响历史的观念而非利益，进步社会运动最伟大的成就也就是改变了美国人的观念，认识到了积极自由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让美国人从殖民阴影中走了出来，消除了对政府的戒惧，这也为以后的罗斯福新政、约翰逊伟大国家建设等美国文明的狂飙突进奠定了思想基础。而“进步运动”、“新政”、“伟大社会”建设，也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的国家治理结构和美国社会，如果没有这些改革，我们不可能看到今天的这个繁荣、强大、对公民负责的美国，世界也不会出现一个所谓的“美国文明”。

在这里我们还有必要对古典自由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进行一下说明。古典自由主义发源于17世纪和18世纪，自由市场等概念最先也是由古典自由主义所提出。其实古典自由主义与中国很有渊源，世界上“自由放任”一词的提出源于中国老子的“无为”，法国经济学家魁奈第一个将“无为”翻译成“自由放任”，魁奈是法国最著名的学者，也是汉学家，有着“欧洲孔子”的美誉，亚当斯密是魁奈的学生，也就从魁奈那里继承了自由放任的思想，将“无为政府”更形象化了，称为“守夜人政府”，古典自由主义政府认为干预会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因此主张将政府排除出经济领域，让经济生活自行其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自由放任在当时是具有先进性的，但亚当斯密生活的年代与现在截然不同，亚当斯密时代火车还没有发明，货币运输还主要靠马车，大家可以想想当时的情况，甚至是后工业社会，不仅出现了全国性的大企业，而且出现了跨国的世界性大企业，自由放任早就不适用了，对经济进行监管是必然的。其实在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早就进入了历史的垃圾篓，现在人们信奉的自由主义属于现代自由主义。

现代自由主义者主张资本主义与福利主义并行，即在自由的市场竞争的前提下，政府进行适当的干预与监督。具体的：认为自由市场不可完全自我约束，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可是为了确保有足够的自由。它主张政府为了保护公民，使之避免经济体系中某些时候的不公平。现代自由主义者主张的是工资和工作时间的立法、组织工会的权利、失业与健康保险，为所有人改善受教育的机会等等。

现代自由主义信奉机会平等，认为国家应该为公民提供一个起跑点。例如，认为家境的贫寒不应该影响一个人的发展，国家应资助穷人上学，把他们带到一定的起跑线上，以能与条件更好的竞争。

现代自由主义认为公民都有享有一定程度福利的权利，这个问题最好由国家来承办。这些都是现代自由主义的看法，也是学术主流。现代自由主义是一种积极自由主义。

现在人们将那些少数企图复兴古典自由主义的人称为新保守主义者，当代中国的很多自由主义人士，其实就是这种新保守主义，其实他们只是从字面意思上妄解了自由主义而已。

当前的中国与进步年代的美国虽然大不相同，但也有很多类似之处，比如都处于城市

化的高峰期，各种社会问题爆发的相当严重，而且知识界也同样信奉古典自由主义，盲目排斥政府，社会利益均衡机制被破坏。

而中国比美国更复杂的是中国的既得利益群体正在以某种缄默的方式结盟，例如，官员通过读博士而与知识精英结盟；教授通过做项目或是以高额出场费参加各种财经论坛，与商业集团结盟；老板则通过与官员“交朋友”而与政府权力结盟，等等。而更可怕的是当学者与新闻媒体也与强势群体结盟的时候，社会的“良心”捍卫机制就不可避免地坍塌了。而这样的事情正愈演愈烈，商业群体通过广告费、公关费控制媒体，而媒体又通过稿费控制知识分子，比如南方周末曾报道紫鑫药业为“摆平”媒体及记者，以及删除已有的负面报道，公司花掉了“天文数字”的公关费：“几百家媒体，最少的给5万，最多的是400万元，而且这只是一年的保护费，一年到期了，有些媒体和网站要求续签，可见中国媒体行业之腐朽。这种精英联盟已经严重阻碍中国的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所在。

而中国现状的改变也需要中产阶级的成熟和知识分子的觉醒，中产阶级的成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知识分子的觉醒则需要从文革和计划经济的阴影中走出来，正如美国从殖民阴影中走出来一样，这样才能真正担当这个时代赋予知识分子的责任，也才能与中国民众一起致力于中国的社会进步运动和伟大社会建设。

中国学者需要重拾墨家情怀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中国从来就不缺乏高谈阔论、哗众取宠的知识分子，而是缺乏能够真正倾听民间疾苦，然后为民众奔走呼号的分子，而这样的知识分子只有墨家才有，鲁迅这首诗，体现的就是墨家的情怀。

墨子并不姓墨。墨是古代一种罪，墨其额头，本是刑徒之意，引申言之，便为奴役。墨家的精神是与劳动者为伍，与中下层人民为伍，为天下百姓服役，为人民服务。墨者“兼爱”，“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的都体现了难得的平民英雄本色。

作为中国文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墨家在中国的失落，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而谈到中国传统，今天的人们最陌生的，可能就莫过于墨家。而在中国历史上，墨家又是唯一一家替劳苦大众说话的政治哲学和思想学说。

在百家争鸣之后的两千多年，儒家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正统、法家主宰着专制朝廷的庙堂政治、道家占据民间成为隐士精神家园，而墨家命运迥异，恰如一颗流星划过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在短暂的辉煌之后归于沉寂。对于墨家的消失，其实并非因为“义高难行”，而是因为汉朝以后墨学走上与儒学合流之路，儒墨共治诗书，同道仁义，有合流的学术基础，墨学以加入儒学的形式获得永生，儒学则因吸收墨学的优点而重振。至董仲舒建立新儒学体系，儒墨完全融合，墨学精华已被新儒学吸收。

尽管如此，墨家同儒家、法家毕竟不同，墨家不但强烈地反对儒家的贵族政治，墨家也不赞成法家的官僚政治，因为它主张人民的政治，墨家主张自下而上组织人民。因此当今社会仍然有必要重提墨家。

中国对墨家的重新重视，是晚清和近代的事情。当时章太炎、梁启超等人注意到墨家学说主张发展科学技术，有利于富国强兵，遍大力着书立说，倡导墨学复兴，一时间，梳理墨子，阐扬墨学成为社会热潮，墨子学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崇。梁启超说他真是“极为崇拜墨子的人”，“论到人格，墨子真算千古的大实行家，不怕在中国无人能比，求诸全世界也是少见”。胡适称墨子是中国历史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物”。陈独秀、蔡和森也以墨学来理解共产主义理论。孙中山更是将“墨子、华盛顿、耶稣”称为世界三大伟人。

中国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利益调整已成必然，当代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墨家为弱势群体代言的情怀显得更加重要，墨家的“兼爱”就是人与人宽容、平等，强大的不欺辱弱小的，聪明的不欺辱愚笨的，富裕的不欺辱贫困的，从而实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老者得息”的和谐社会。而墨家的“非攻”，则可以引申为利益集团之间在财富的再分配的过程中不能“强凌弱、众暴寡”，不能采取暴力掠夺的方式。非攻以兼爱为基础，体现出深广的和平主义与人道主义，体现出对弱者的人文关怀，是中华文化中稀少的思想火花。而这也应该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怀。

(完)